新芽沙龙·第 30 期

大变局下的世界与中东

2021 年 3 月 30 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一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得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来自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挑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整体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建院三周年之际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资深外交官谈百年大变局”系列新芽沙龙。本期沙龙邀请到了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兼驻摩纳哥大使、现任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先生，以“大变局下的世界与中东”为主题做主旨报告。

·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翟隽大使在讲座伊始提到，中国已经从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更多地了解世界、研究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他指出，当下国际形势主要表现出六大特点：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加速演变，这一进程整体可以概括为“东升西降”。百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全球政治经济核心的地位，掌握全球经济活动的主导权，左右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百年后的今天，政治重心开

始“东升西降”，东方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大大提升。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 年是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加速发展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正从原来占美国的 2/3 向 3/4 的水平跃升。2019 年，中国的 GDP 总量为美国 GDP 总量的 67.2%；2020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71.4%，而根据统计数据预测，今年这一比例可能将达到 75.1%，也就是 3/4 的水平。在英国脱离欧盟后，中国的综合实力整体已经追上了欧盟，而目前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加速缩小则是“东升西降”最显著的标志。

从地缘板块来看，今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总比重有望首次超过 50%，尤其是东亚板块正迎来新一轮的跃升机遇。从大国对比来看，在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尽管美国仍然在经济存量上存在一定优势，但其他大国如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印度已经不存在对中国的存量优势，同时其经济增长上也存在短板，整体而言同中美的实力差距正在扩大。未来十年，中美两国的 GDP 总和有可能超过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使中美这两大引擎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换言之，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正从数量差向级别差转变，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中国正迅速对其进行追赶。中国的发展速度将会是未来国际格局的关键变量。

第二，大国间关系正发生深刻调整。近年来，美国国内种族矛盾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同时在本次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与控制较为混乱，并频繁对中国政府进行打

压抹黑、甩锅推责。目前来看，中美矛盾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中美博弈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线。

随着几个主要大国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他国家也在调整各自的对外与对内政策。目前，除了中美矛盾，还有两组“大三角”关系对国际形势的演变至关重要：中美俄三边关系与中美欧三边关系。近年来，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在来自美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国与俄罗斯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各项合作愈加紧密，中俄两国逐渐成为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国关系开启了新一轮的调整进程。一方面，尽管中美关系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但从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来看，美国试图重振其同盟体系，并在抗击疫情、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议程中重返多边平台，中美关系整体已经开始止跌回稳。不过，美国是真正致力于多边合作，还是进行选择性、排他性的多边合作，未来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中欧关系整体仍在发展中，去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顺利完成就是双方合作中一项主要的积极成果。但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内部团结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欧洲各国进行菜单式、议题式合作的倾向更加明显，即只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开展一些合作。

第三，围绕全球治理问题，各国矛盾更加突出。2020 年突然暴发的疫情给全球发展按下了暂停键，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一大批国家（GDP 总和占世界总量一半）提高了外资准入门槛，以此倒逼全球化从资本逐利驱动转向效益安全驱动，同时引导产业链从全球化、全域化布局转向多元化、

区域化、本土化布局。

从中长期看，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但疫情中暴露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缺位问题使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边缘化风险。具体而言，未来逆全球化风险陡增，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进步力量与霸权力量之间的较量将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的捍卫者，未来与发达国家围绕全球化规则、秩序的争论将趋于激烈。

第四，世界经济进入非常规衰退期。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大幅滑坡，造成全球性的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2020 年世界经济整体下降 3.5%，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萎缩 4.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萎缩 2.4%。但目前来看，得益于全球疫苗大规模接种以及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支持，2021 年世界经济复苏预期较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5.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为 5.6%，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预测相对保守，分别为 4.7%与 4.0%。

就美国而言，拜登政府不久前出台了总计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美国国内疫苗接种也正在加速推进，美国今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3%以上。但同时，美国的货币宽松所带来的外部溢出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影响，引发了很多专家的担忧，这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第五，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之争愈发激烈。此次疫情是一次综合性危机，也是对国家治理的一次大考。面对疫情的考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应对形成鲜明对比：当世卫组织宣

布全球发生新冠疫情大流行时，中国是疫情防控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当时的确诊病例占全球的 67%，死亡病例占全球的 74%。但现在，中国已经在全国抗疫斗争与经济复苏工作中取得了许多重大战略成果，很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却以不到全球 5%的人口比例承受了超过 20%的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

拜登政府上台后，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国内疫情形势有所缓和，但其前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到了深刻教训，暴露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资本分配失衡、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源错位、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等。面对这种反差，美国与西方国家一部分学者与政客对其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进行了理性反思，但更多人则是提升了战略上的焦虑感，开始加大力度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曲解中国的发展意图和内外政策，企图以意识形态为抓手挑动新的文明冲突。总体来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与西方两者的发展道路之争变得更加突出。

第六，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数字发展鸿沟继续扩大。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线办公等新业态迎来蓬勃发展，在未来若干年中，第五代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技术等新兴技术都将会迎来重大进展，通信革命与智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进步势必引领数字经济及数字货币发展，萌生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新力量，而加密数字货币的研发和监管都将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竞争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先导力量，各领域赢者通吃的迹象愈发显著。科技民

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各国将加紧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鸿沟也将进一步拉大。

• 如何应对新型国际形势

翟隽大使从外事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就中国如何应对新国际形势提出六点看法：

第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应始终牢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达到美国 3/4 的水平，但从发展质量上看，我们与美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加快发展振兴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则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在当前的外交工作中，我们要着力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宣传推广中国新发展理念，为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在外交工作中，常常有“周边国家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说法。总体而言，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需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博弈的必然性、长期性、复杂性。一方面，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并在涉台、涉疆、涉港等主权问题上频频发难，我们要坚定自信、保持定力，

绝不允许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进行任何侵犯；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两个大国，我们一直希望和美国建立一种不冲突、不对抗、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一直在双方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如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与美方争取接触、开展对话，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可控制、可预见的状态。

第三，在国内经济复苏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助力世界经济加快复苏。中国需要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中国超大型市场的强大内需潜力，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第四，继续深化国际和地区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效实施。目前而言，中国已在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区域性合作，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中欧经贸合作新格局，推进中日韩三方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计划等等。未来，我们仍需对区域与国际合作持积极参与态度。

第五，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变革。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我们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合作、坚持与时俱进，始终站在国际正义一边。我们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同各方共同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六，不断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我们应积极开展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倡导不同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在当前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讲好中国故事”，是让世界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更加准确地读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彼此的信任。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奋斗不止的故事，我们取得今天的成绩不是谁给的，革命胜利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成功也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中国的发展只会给世界提供机会，不会威胁任何人。我们从来没想过取代美国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我们只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

翟隽大使总结道，面对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加强机遇意识，也要加强忧患意识与风险意识。一方面，对中国而言，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定自信、主动作为，在各项工作中努力将百年变局转化为百年机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到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要认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平稳崛起，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不会改变，甚至在民主问题、人权问题等话题上，其态度相比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加强硬，也可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攻击。在中短期，我们面临的困难在增多，阻力也在

加大，我们同美国的战略较量将是长期的，需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 大变局下的中东地区

在谈到大变局下的中东地区时，翟隽大使表示，分析中东问题首先要理解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地理上，中东地跨亚非欧三洲，连通地中海、里海、黑海、红海与阿拉伯海。在最近埃及苏伊士运河堵塞期间，每小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四亿美元，足见其作为国际海路航道交通要冲的重要性。在资源上，中东地区能源资源富集，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的 56%，天然气储量占全世界的 44%。翟隽大使提出，观察百年大变局下的中东地区，大体可以从四个角度出发：

第一，中东地区是“东升西降”国际力量演变的参与者，但整体处于落后的位置。百年大变局之“变”，首先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东国家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产地与保障国际能源安全的支柱，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是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富国依靠石油美元迅速积累了财富，人均 GDP 长期名列世界前茅，以色列的创新实力则在全球首屈一指。

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在产业上受到页岩油与新能源的冲击，同时在外部遭受油价持续低迷、全球疫情蔓延等多重打击，经济发展承受着较大压

力。以几个地区大国为例，伊朗长期遭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埃及发展遭遇挫折，土耳其也面临里拉暴跌带来的经济挑战。从横向看，中东经济发展表现不如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从纵向看，中东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工业化水平普遍较低，失业率、贫困率在近年来快速上升。因此，中东地区在“东升西降”中处于落后的位置。

第二，中东既是国际秩序震荡的受害者，也是新秩序酝酿的风向标。百年大变局之“变”，集中体现在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中东地区地理位置整体趋于边缘，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明显缺位失声，在关乎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讨论中人微言轻，常常成为交易中被牺牲的一方。

历史上，从英法控制到美苏争霸，再到现在美国一超独霸，中东一直处于大国博弈的前沿，也是大国兴衰之地。以巴以问题这一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为代表，长期大国博弈的破坏性在中东地区表现深刻，中东地缘格局遭受反复撕裂拉扯，域内各派力量矛盾加剧、纷争不断，令中东成为全球动荡的风暴眼与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今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周年，目前中东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阿拉伯国家整体的走弱与走散。曾作为中东第一大国的埃及长期受到社会动荡困扰，叙利亚与伊拉克等国则饱受战争与恐怖主义之苦。同时，在“阿拉伯之春”中穆斯林兄弟会凭借其群众基础迅速崛起，并逐渐形成以卡塔尔与土耳其为首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以埃及与其他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这使得中东地区的矛

盾更具复杂性。当前中东问题既涉及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五大民族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也牵涉到什叶派、传统逊尼派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宗教纷争，更关联着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地区利益博弈，因此经常被形容为“按下葫芦浮起瓢”。

同时，新的国际秩序在中东初露端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从战略上逐步撤出中东大势已定，俄罗斯正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欧洲则对中东事务力不从心。目前，中东已成为中国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阵地，未来中国也将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扩大地区影响力。

第三，中东是新兴技术革命的后进生。从国际角度看，新兴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化中深入推进，科技和创新实力越来越成为一国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开始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谋求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中的有利位置。在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在创新科研领域实力较强，沙特与阿联酋等国在武器制造与航空航天等领域进步较快外，中东国家整体并没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在全球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处于落后位置。

第四，中东是民粹主义勃兴的集中区域。“阿拉伯之春”以来，在内部各国民众示威相互联动、外部美西国家推波助澜的双重作用下，穆巴拉克、卡扎菲、巴希尔与布特弗利卡等长期执政的强势领导人相继下台，随之而来的是民粹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登堂入室”。此外，宗派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政治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思潮长期以来在地区内相互激荡，也成为地区久无宁

日的重要内因。

• 对中国中东政策的展望

谈及在大变局背景下，未来中国的中东政策时，翟隽大使指出：百年大变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正是中国的持续崛起。目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 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拜登政府中东新政的核心是以价值观外交重整中东盟友体系，重塑美国地区领导力和影响力，同时将中东作为全球遏华战略的重要模块。

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主权角度看，近期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频繁在新疆问题上无端攻击中国，而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中心，如果可以在这一问题上与我们站在一边，将是对西方国家的有力回击。从安全角度看，处理好与土耳其和沙特等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在源头上控制宗教极端分子和分裂主义势力带来的境内安全威胁。从能源角度看，中国每年一半以上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中国也是中东原油的最大买家，这种经济上的重要性是相互的。

翟隽大使还指出，未来影响中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地区政策的调整。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大势所趋，而从王毅国务委员此前访问中东六国时提出的五点倡议可以看出，中国中东政策未来的一大改变就是在更多维度主动运筹。比如在此次访问中，中国主动提出就巴以问题召开权威性国际会议，并提出在国内举办海湾地区多边对话会议，推动地区国家平等对话协商。五点倡议的提出体现出中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动性与

创造性，这与过去是不一样的。

在提问环节，现场听众就中以关系、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中国的地区平衡战略等问题进行提问。在谈到中以关系时翟大使指出，中国与以色列是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是以双方在各领域的共同利益作为支持的。同时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明确的，即落实好“两国方案”，中国也一直支持国际社会朝着这一目标积极斡旋。在谈到新冠疫情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他指出，在新冠疫情暴发伊始，第一个向习近平主席致电慰问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而中国国产疫苗的三期试验是在阿联酋进行，中国也向中东地区许多国家提供了医疗物资支持。可以说在这次疫情中，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合作与友谊进一步加深了。在谈到中国的地区平衡战略时他指出，中国一直努力在外交工作中兼顾各方的合理关切，无论是 2019 年在华举办的中东安全论坛，还是王毅外长此次出访中东所提出举办海湾地区多边对话会议，都体现了中国为改善中东各国彼此关系所付出的努力。最后，翟隽大使还鼓励同学们未来应多尝试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感兴趣的问题，保持深入思考的优秀习惯。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王锁劳在总结时从四个维度对翟隽大使的讲座进行了概括：第一是高度，讲座内容完全脱胎于翟隽大使长期主管中国对中东外交事务过程中总结的经验与体会，令人受益匪浅。第二是广度，翟隽大使既对当今国际形势进行了客观总结，也提出了他作为外交官对具体外交工作和中东地区现状的主观思考。第三是深度，讲座内容既不乏理论提炼，许多例证也来自翟隽大使多

年来在外交实务中的亲身体会。第四是温度，翟隽大使多次提出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出他作为一位高级外交官员的人文关怀。

新芽沙龙·第 31 期

大变局下先秦思想的启示

2021 年 4 月 19 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一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得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来自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挑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整体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建院三周年之际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资深学者谈百年大变局”系列新芽沙龙。**本期沙龙特别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教授王秦丰，围绕“大变局下先秦思想的启示”做主旨报告。**

王秦丰首先指出，理解“大变局”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世界维度，第二个维度是中国维度。从世界维度看，就是通常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一战、二战形成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从中国维度看，大变局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是李鸿章在同治 11 年上书时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三千年是从西周开始算起的。中国自西周以来的文化和历史于此时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至今仍没有完成。李鸿章时期要应对的是西方的船坚利炮和西方文化，而目前的中国仍要面对西方科技工业优势大、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

位的现状，两个时期的情况并没有本质差异。大变局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机遇。中国能否在大变局中把握主动，使中华文明再创辉煌，使中国再次走向世界巅峰，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将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这段时间称之为“轴心年代”，在这 600 年间，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全部诞生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摩尼、佛陀，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等。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时代”是人类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与自然界在此时真正地区分开了。而对中国来说，“轴心时代”恰好是与先秦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相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智慧到现在还影响着人类，每当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困难时，人类总会回过头追溯“轴心时代”思想家们的思想，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王安石变法、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也是通过回顾先秦时期(“轴心时代”)去寻找思想依据。王秦丰认为，今天的人类，实际上也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变化，可能还需要继续向这些先人们请教。

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思想方面或个体领悟方面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源于古典世界。与古典世界的接触就是与“轴心时代”的思想或先秦时期思想的接触。因此，王秦丰认为，当代大学生在学好自己课程的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先秦时期的经典和思想，通过与古人

对话来获得做人做事的启示。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形成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源头。胡适先生是第一位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当时蔡元培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高的评价，称其“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的手段。” 以往的思想史往往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而从三皇五帝到老子、孔子的时期，实际上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且文字记载不明确。因此胡适选择从有明确记载的先秦时期开始写起，也因此称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 诸子百家的分类

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汉书 • 艺文志》对诸子百家的分类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共记录了 189 家，引了 3000 多篇文章经典，但其中大部分都遗失了。更早对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将诸子百家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欣赏道家，认为其思想玄妙深远。《汉书 • 艺文志》将百家概括为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还有不入流的小说家。

先秦时期，真正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只有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韩非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则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其中的杨是杨朱，即道家，墨就是墨家。对中国历史真正有影响的只有三家：儒家、道家、法家。王秦丰认为，儒家和道家实际上形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和文化结构——得意时积极入世，建立功勋，遭受挫折时归隐

田野、退隐山林。因此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说法：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一体两面。而儒家和法家形成了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国历代传统社会，名义上是儒家治国、以德治国，实际上也信奉法家的思想，依法治国、严刑峻法。简单来说，中国历史上就是“阳儒阴法”、“外儒内道”。墨家在秦汉之际彻底终结，实际上没有对中国历史起到太大影响，直到清朝时才重新被挖掘出来。

另外，先秦时期有一家是纵横家，纵横家最初出自于负责礼仪、接待宾客的朝廷官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纵横家。纵横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外交家，受君王委派、获得一定程度的授权，出使其他国家。

• 春秋战国诸侯关系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由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西周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东周一直动乱不已，“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的分界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病故，另一种是公元前 453 年三家分晋。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诸侯关系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处理关系使用的是会盟方式，而战国时期主要是通过合纵连横的方式。

据《史记》记载，西周时期共有 800 个诸侯，按照公、侯、伯、子、男来分封土地。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开始进行兼并，例如齐国就兼并了 20 多个诸侯国，晋国兼并了 40 多个诸侯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春秋五霸——秦桓公、晋文公、宋襄公（一说吴王阖闾）、秦穆公（一说越王勾践）、

楚庄王。五霸的形成就是依靠会盟的形式，最典型的就是公元前 656 年的召陵之盟（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带着 8 个诸侯国在召陵召集其他诸侯国进行会盟，会盟中推举齐国为霸主，制定了互相之间不能侵略的规则）。会盟的另外一种形式，即由弱国主持，由大臣而不是国君参加的弭兵之盟。公元前 576 年和 546 年，由宋国提议并主持了两次弭兵之盟，会盟上承认晋国楚国平分权力，共同保持社会稳定和诸侯国之间的和睦相处。宋国召集的弭兵之盟，对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的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的进步，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战国时期最主要国家有七个：秦、魏、赵、韩、齐、楚、燕。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尚且能维持和平共处的状态，但在战国时期这一状态就发生变化了，此时各国间采取的战法和谋略就变成了合纵和连横。这一时期的代表是苏秦和张仪，苏秦是合纵的代表，张仪是连横的代表。

• 大变局下的先秦思想启示

大变局下先秦思想的启示可以分为理念价值层面、智慧层面和谋略层面三个方面。

理念价值层面实际上是价值观层面，即对国与国之间最基本的看法等。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人的观念变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人们的行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不一样了。理念层面的东西是最高层面的，但同时也是含有基本价值取向的。

王秦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比西方社会强调的天人两分、人与自然的对立

更有意义。《老子》中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人与天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概念，也可以推广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概念上。西方社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矛盾，进一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就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典型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间的冲突"。

以德服人主要源于儒家思想，一般将其理解为一种管理国家的方法，即德治。这一思想同样能够应用于处理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王秦丰认为，美国目前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用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以力服人"，这显然不如中国的以德服人有生命力。以德服人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重义轻利、讲究诚信、讲信修睦等。以德服人在现实中是否可行，需要深入研究，但这不妨碍其作为应当追求的目标。

中庸之道源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在为人处世、处理问题时要不偏不倚，不能过于极端也不能过于保守。儒家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最基本的思想或者说心法。在儒家看来，中庸之道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社会管理政治的原则，还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原则。《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讨论自然界中的中庸之道。

忠恕原则是指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观点，自然会产生争执和矛盾，对此应该采取忠恕的原则处理问题。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弟子评价他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恕，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要能够包容不同个性、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与他们合作共事。对国家来说，就是要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有所包容，以实现和平共处。另外，忠恕原则不仅要求包容，还要求宽恕——当对方认识到自己错误时，能否宽恕他对你的伤害，这要求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慎言兵者，即对使用军事武力要谨慎。老子说："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意思是如果用道理、理念、价值去辅助君王，就不能用武力去压迫他人，否则会遭受报应。《孙子兵法》开头也提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资料称人类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 5500 年，其中发生有记录的战争 14000 多次，平均每年 2.6 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几个国家约 15 亿人参与，3000 万人伤亡。二战时 60 多个国家约 30 多亿人参与，9000 多万人伤亡。因此，需要对"慎言兵者"理念给予重视。

家国情怀。孟子强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民族国家以及国家观念是 19 世纪 20 年代随着现代社会产生而产生的。中国的民族国家概念由西方输入，与中国早期诸侯国的概念或天下的概念不同。虽然如此，民族国家既然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于中国，爱国就是不需要理由的。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区分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亡国是改朝换代肉食者谋之，亡天下则是整个民族、国家文化的消亡，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智慧层面的启示，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方法论，但和知识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对"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崇拜，

都不是对他们知识的崇拜，而是对智慧的崇拜。实际上，人类发展至今，在知识层面早已超过了“轴心时代”思想家们想到的和获得的知识。但是，在智慧方面，我们仍不如“轴心时代”的思想家。

和而不同，即允许不同文明、民族、文化同时在世界上存在，且应和谐相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追求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实现完全统一是小人的做法，君子的做法是允许不同文明和文化同时存在。

礼尚往来。《礼记》说：“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句话既可以从正面理解，也可以从反面理解。例如美国现在打压中国，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去反击，以牙还牙。正面意义的礼尚往来比较简单，而如何把握负面、对立意义上的度，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值得深入研究。

谦虚低调。老子说：“大国者下流”，意思是大国在小国面前不应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而应处在底下的位置，尊重小国。老子还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意思是因为江海的位置处于下面，所以能成江海，否则只不过是从源头流下的小溪流罢了。老子谦虚低调的思想，不仅能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在为人处世方面。老子的思想在人类社会的应用，就是教人谦虚低调，教人“柔弱”。《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老子贵柔。”老子强调谦虚，很重要一点在于“柔弱胜刚强”，这种思想容易被理解为权谋之术，例如朱熹就曾批判过老子“心最毒”。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智慧级别的，《易经》六十四卦中的谦卦也反映了这样的思想。可

以说谦虚低调、尊重他人，是人的立身之本。

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如果只知彼不知己，只能做到一胜一败，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处理区域国别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对其他的区域或国家不了解，盲目凭着想象，是很难处理好问题的。

谋略方面的启示属于方法层面，如何对待一件具体事情，如何采取对策，都属于谋略层面的问题。如果说理念部分是形而上者谓之道，那么谋略部分就是形而下者谓之气。理念、价值观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具体做法层面的问题。

王霸结合。《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在谋略层面，既要以德服人，在处理问题时强调理念和价值观，同时也要讲以力服人，以实力作为自己的支撑。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价值理念。

合纵连横。当你是强国时，你要"恃一强以攻众弱"，当你是弱国时，你要"合众弱以攻一强"。两者很多时候可以结合起来，不应只强调一个方面。合纵连横还反映了一种思想，即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能够被区别对待。比如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依靠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集中批评美苏两霸，这就是同时兼用了合纵连横的观点。

以柔克刚。老子说："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善利万物，却从不显露自己，没有自己的形状，谦虚低调、有容乃大，并且可以净化污泥浊水。任何坚硬之物被水附着最终都会被消蚀，即水滴石穿。

韬光养晦。这个概念实际上并非来自先秦思想家，而是在《旧唐书·玄宗纪》中出现的。唐玄宗在政治斗争中隐藏自己的想法，就是韬光养晦的表现。这个思想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先秦，老子说："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其中"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就是说想要摧毁敌人，必先使敌人骄傲，自己趁机养精蓄锐。韬光养晦要求少说多做，这种思想在孔子那里体现的更加明显。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仁矣""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都反映了这种思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也是韬光养晦思想的源头。

在讨论环节，王秦丰教授与现场听众就报告内容进行了交流。王秦丰指出，现在的传统文化或国学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国学开始变味，声誉有所下降；二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等历史因素导致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三是在学术领域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针对年轻人难以理解传统文化的问题，王秦丰提出可以先从《老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本主要著作入手，从原典出发积累传统文化的基础，夯实根基、提升水平、不断进步。他还指出，国学中存在着国渣和国粹，今天需要传承的是国粹，而糟粕的部分是应批判而非继承的。改革开放要求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能推动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使中华文明再创辉煌。

在谈到秦国的崛起与法家，连横思想的生命力问题时，王秦丰认为，秦国的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家思想虽然为秦国夺取天下提供了重要帮助，但其自身的缺陷

却导致秦国在治理天下时“二世而亡”。连横只是秦国使用的策略之一，在秦国弱小时其也曾采取过合纵策略，因此在策略的选择上，秦国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最终成就了统一天下的霸业。

当被问及韬光养晦与卧薪尝胆的异同以及如何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的概念时，王秦丰认为，卧薪尝胆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敌人，而韬光养晦的目标是和平共处，这是本质的差别。他还表示在与西方交往时，主要还是通过沟通、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但不一定非要强求别人接受。对于民本与民主的区别，王秦丰认为，民本思想涉及如何认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要体现在《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民”上。儒家对民本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另一种是荀子的民水君舟，但这些实际上都是传统文化对民众和统治者关系的一种认识，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提出的。民主思想则是在尊重百姓权利的基础上，对公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思想，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总结时表示，王秦丰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深刻哲理，这些哲理具有非常高的适用性。王秦丰教授从三个方面为我们讲述了大变局下的先秦思想启示，而他回到传统、古老的中华文化源头上，从传统出发思考和处理当今的国际问题，这对在场的师生也是一种启示。传统文化经历过两个极端，一是过去对它的彻底否定，二是将国学当作装点门面都工具，两者都是有问题的。对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正确理解，从中寻找智慧和对今天有用的思想，

从古代的哲人和思想中提取对现代有用的理念精华，除去糟粕，才是研究传统文化正确的立足点和观察点。